

2401
《贵州近现代史料丛书》之一

漫步 夕陽路

杨瑞芝
著

中国近现代史学会贵阳市会员联络处编

漫步夕陽路

杨瑞芝 著

中国近现代史料学会贵阳市会员联络处编

1997年8月·贵阳

贵州近现代史料丛书之一

漫步夕阳路

杨瑞芝 著

开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印张: $5\frac{3}{8}$

字数: 116 千字 印数: 1 - 600 册

处理: 交流与赠阅

准印证: 黔新出(97)内图资准字第 1 - 030 号

工本费: 7 元



1995年9月1日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奥运村广场举行开幕式,此为作者在开幕式前留影。



1993年3月31日“马鞍山求学纪念碑”在(原国立十四中旧址)省团校举行揭牌仪式。此照为揭牌仪式后作者于碑前留影。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作者在广州华侨新村
卢慈定表姑处与表姑相会时合影（墙上照片
为卢涛烈士。卢慈定为卢涛先生之爱女，已
在香港病故。）



1992年10月上旬，台湾“黔人杂志”与贵州《山花》、《贵州文史丛刊》两杂志
社同仁共聚于贵阳市屋顶花园。照片站立者左一：任时雨先生，右二：任时燮先生
（黔人杂志社长），左一：马长骥先生，左二：杨瑞芝主委。



1985年7月贵阳市民革赴纳雍教育支援小组,于支援工作结束时在县委门前合影。前排右:周振琴老师,中:杨瑞芝老师,左:傅天禄老师;第二排中:黄兴嘉老师(已故);第三排左一:杜云峰老师,左二:周弘文老师,左三:姬振宏老师。



1993年5月,作者参观兴义民俗风情展览馆在民族青年塑像前留影。

序

廖海波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因此从旧营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真切，因此也反抗最力。”读了杨瑞芝同志的《省长夫人轶事》等作品后，深为鲁迅先生的洞察力和精确的概括所折服。瑞芝同志以细腻的笔触，生动的描写，把一个“省长夫人”兴衰沉沦的一生呈现在读者面前。从中，人们可以看到对旧营垒没落腐朽生活的无情揭露，也可以看到作者对新生活的无限热爱，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一片忠诚。

瑞芝同志参加革命工作后，较长时间从事小学教育工作，由于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对小学语文教学颇有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专职作民主党派工作，能够团结所联系的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发挥参政党的作用，工作成绩显著。1990年被选为政协贵阳市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席。任期值至1996年3月换届为止，在这期间我们有着五年良好的合作共事关系，共同为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团结合作，做到了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其间，瑞芝同志尽心尽力作好分管的工作，积极参加支边咨询活动，在各种会议上当诤友、进谏言，对市政协的工作热心参与，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在作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她勤于笔耕，写下了不少文章，有属于“三亲”性质的文史资料，也有纪实性的随笔和游记，都

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现在由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贵阳市会员联络处作为《贵州近现代史料丛书》之一,结集出版,这是一件有益于历史研究的事,故为之序。

作者简介

贵州省史学学会近现代史研究会荣誉理事杨瑞芝,1926年10月出生,女,贵阳市人,大学文化,中学高级教师(职称副高),民革党员。

1951年3月参加工作,先后担任过小学语文教师、教导主任以及贵阳市教育局教研员。1983年以后任民革贵阳市委员会专职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主任委员。1984年以后当选为民革贵州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革中央委员,1990年任贵阳市政协副主席,同时任贵州省妇联副主席。

1956年被评为贵阳市小学优委教导主任,1984年被评为贵阳市“三八”红旗手,1985年被评为全国、贵州省和贵阳市为四化服务先进个人,出席全国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表彰大会。曾参加编写《小学语文基础知识复习指导》一书,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另还编写《小学古诗教学参考》一册,在《贵州政协》、《贵阳统战》、《爱晚诗刊》、《黔灵吟草》等刊物上多次发表理论文章,记实文学和古诗等。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贵阳市会员联络处)

目 录

序	廖海波 (1)
---------	-----------

作者简介

.....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贵阳市会员联络处 (1)	
在中国共产党的阳光照耀下	(1)
参政议政的大讲坛 增长知识的大学校	

——当了政协委员的感受	(8)
省长夫人轶事	(16)
童年拾趣	(44)
参加教育支边工作的回顾	(62)
回忆抗日战争中的国立第十四中学	(71)
同根同源手足情	(80)
重温往事 再受教育	(87)
潺潺清流暖人心	

——参加省橡胶配件厂自来水工程竣工剪彩仪式随想 ...	(91)
参加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95 北京 NGO	

妇女论坛的感受	(94)
怀柔见闻	(101)
生命的露珠	(107)
趁着夕阳走一程	(131)
诗(二十七首)	(153)

后 记

附:关于编辑出版《贵州近现代史料丛书》的办法

在中国共产党的阳光照耀下

1949年10月1日，庄严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饱经忧患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束了几千年剥削阶级的统制和长期遭受帝国主义欺凌的苦难历程，昂首挺胸拼搏前进。随着祖国前进的步伐，我也曾走过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但更多的是获得新生后的欢乐与振奋。

1990年12月底召开的贵阳市政协七届一次大会的闭幕式上，市广播电台的记者采访了我。她们首先提出的问题是：“你由一个普通妇女今天当选为贵阳市政协副主席，有什么感想？”我的回答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我们妇女得到了彻底的解放！”我虽然生在旧中国，但我的成长是在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我从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待业青年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岗位，各方面不断得到提高。我深刻地体会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幸福的今天。

一、在共产党的教育帮助下我当上了光荣的人民教师。

1951年初，我收到参加小学教师训练班学习的通知，这是我踏上新中国教育工作岗位的开始。师训班结业后，我被分配到贵阳市龙井小学工作。以后，我又继续参加了两期寒暑假

教师训练班学习(担任小队长、副中队长),参加了1953年的教师代表会的思想改造学习。我的工作也从担任毕业班班主任、语文教师提升为教导主任,1956年暑假后被调到贵阳市教育局教研室担任语文教研员。

几次师训班和教师代表会都是贵阳市教育局举办的,主持人是王健民同志(当时是人事科长,后担任副局长、局长)。他给人的印象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我们在师训班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为人民服务》等革命理论。通过听课和讨论,我认识了新旧社会本质的不同,懂得了剥削可耻和劳动光荣的道理,理解了人生的价值是为人民服务。但是,我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我的家庭成份在全体学员中是最差的(贵州军阀周西成之媳,父亲杨家骥是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的国民党军官),自己有没有前途呢?越学越没有信心,产生了严重的自卑感。王健民同志了解后,找我个别谈话,对我讲解“有成份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出身不由己,道路自选择的道理,鼓励我克服了自卑思想,使我一头扎进工作中,从不懂到懂,从生疏到熟悉。在校长戴延昌同志的耐心帮助鼓励之下,我以良好的成绩送走了几个毕业班,被评为市的优秀教师、优秀教导主任。以后王健民同志不断以我为例子,鼓励家庭出身不好的教师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为了帮助我提高业务水平,1958年初,市教育局选送我到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音研究班学习。这是多么宝贵而难得的机会啊。贵州全省选送前往该班学习的仅5名,贵阳市就占了两名,另一名是贵师陈静芳老师。这种学习在旧中国对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是万万办不到的。我们怀

着激动的心情踏上征途。我和陈静芳之间也通过学习班的接触加深了相互的了解,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学习的主要内容是汉语拼音方案、推广普通话和方言调查等,这些都是我国文字改革的主要内容。革命前辈吴玉章老先生,著名教育家叶圣陶、语言学家王力、徐世荣等都亲自给我们讲了课,使我们获益匪浅。学习期间我们还参加了十三陵水库工地的义务劳动;和北京高等院校的学生一起参加了“五一”节前夕的天安门广场联欢,和“五一”节的游行,在天安门前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我们利用假日参观了北京天文馆圆顶大厅,作了一次“宇宙旅行”,参观了鲁迅故居。颐和园、北海、中山公园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有一天我们在苏联展览馆参观轻工业展览时,一位慈祥的老人主动来到我们面前,笑着问我们:“听你们的口音,好象来自四川、贵州吧,你们到北京来干什么呀?”我们一边回答一边看着他。有一位同学忽然大声地说:“哎呀!我知道您是谁了。”原来这位和善的老人就是彭德怀将军,正巧那天他也来参观。我们都争着和他握手,他很高兴地和我们摆谈,勉励我们努力学习。可惜一会儿他的卫士们就簇拥着他走了。虽然我们的学习时间仅半年,但收获是很大的,我取得了第一名,把优异的成绩带回贵阳市教育局。回贵阳后,省教育厅留住我们5人,及时举办了几期中、小学教师汉语拼音方案及普通话学习班,培训了我省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和推广普通话的教学骨干。市教育局也给我增加了一个任务,要我兼任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和推广普通话的专职干部。

1959至1961年,我国遭受了三年特大自然灾害。市教育局部分同志患了30号病(浮肿病),我也是患者之一。为了便于治疗和利于康复,教育局领导把我们这些病号集中起来,住

在飞山街教师进修学校,尽可能为我们补充营养食品,教育局农场生产出的包谷、黄豆也首先供给我们。章德华同志当时是中教科长兼教研室负责人。她把自己得到的一大瓶营养药品执意送给我,使我非常感动。那时,我亲身体会到市教育局的领导和共产党员都做到了把福利让给其他同志,把困难留给自己,他们体现了良好的党风,不愧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由于集中治疗,重点照顾,不久我们就恢复了健康。

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使我的政治生命再次复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政治路线,对于被“四人帮”和极左路线破坏的各条战线进行了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暖了祖国的每一个角落,也吹暖了我的心。在“文革”的极左路线冲击下被迫离开教育工作岗位的我,在党的亲切召唤下,1978年又回到贵阳市教育局教研室工作了。由于十年来大部份时间是在挨批斗、写检查、搞劳动中过去的,业务荒疏了,我能否胜任这一工作呢?因此,对于是否回教研室这个问题,我徘徊了一段时间。当时的教研室负责人徐秀芳同志数次访问我,与我谈心。她说:“十年动乱,教育战线整个倒退了。岂让你一个人荒疏了业务,恢复教研室,就是要脚踏实地,一步步地把工作抓起来。你这个老教研员是责无旁贷的啊。”一席话温暖了我已经冻僵了的心,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回教研室后,教育局的领导为我们提供了开展工作的良好条件,并为我们订购了许多书报杂志。当时负责语文的是我和都精忠老师,负责数学的是刘延慧和陈宝燕老师。我们针对五个区的情况

开展了不少教研活动；组织并参加了我市几次初中入学考试的统考出题及组织评卷工作；为教师进修学院行干班上语文教材教法课；编写学习参考资料……。总之，在回到教研室这一段时间，我感到自己各方面进步比较快，工作效率也比以往高得多。这主要是由于共产党使我的政治生命复苏了，工作生命也焕发了青春。

记得在1984年初夏，市建委有两位同志来访问我，我感到很突然。交谈之下，才知道他们是专为落实政策，了解我在“文革”中被“抄家”的情况而来的。以后又数次来访，不厌其烦地根据我提供的线索进行核实，最后按有关政策规定给予了一点经济补偿，虽然为数很少，但体现了政治上的彻底平反。这件事使我深受教育。政策得到落实，激励着我更加努力工作。我的孩子们通过自学或参加在职进修，都已达到大专毕业水平。有三个孩子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孩子因当时工作需要参加了民革。我们全家都享受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阳光和雨露，幸福地生活，愉快地工作。

三、中共中央号召民主党派开展智力支边使我有继续为教育事务的机会。

1980年底我参加了民革，1984年3月正式被调到民革贵阳市委机关任专职领导职务。我这个教育战线的老兵又成了统一战线的一名新兵了。正当我为不能继续从事我所热爱的教育工作而深感遗憾的时候，中共中央发出了民主党派开展智力支边的号召。中共贵州省委还号召就地挖掘我省各民主党派的智力资源，组织起来，到边远民族地区进行讲学和科技咨询服务。这就为我创造了继续为教育工作作贡献的机会。从

1983年到1990年这段期间,通过各级支边办组织和县区的直接邀请,我曾到修文、平塘、毕节、独山、荔波、贞丰、纳雍、镇宁、罗甸、印江等二十多个县区参加教育支边。有的是帮助小学语文教师学习教学大纲和过好教材关的辅导讲课;有的是教材教法方面的专题讲座;有的是应教师要求直接给学生上的讲究课。此外还编写了一本《小学古诗教学参考资料》,此书是贵阳市支边办约稿、内部发行,作为各县区教师的参考资料。

我们每到一个县、区支边,都受到当地党政领导和听课教师的热情接待。学员们冒着酷暑,专心学习,执着追求进步的精神,给我很大的鞭策。因此,我虽然患有高血压症,或家里有特殊情况(儿媳即将生产,已住院)时,或正在过春节,我都毫不犹豫,按时出发,前往支边。到荔波支边正值冬季,我除了组织小学语文、数学教师共6人前去之际,还应邀将我的大儿子杨霜也组织前去为该县举办书法培训班,为各地农民书写春联等。我的女儿周振琴和我都是讲语文方面的内容。贵阳市支边办赞扬了我家一门三人共同前往支边的积极性,给了很好的评价。

1985年10月,我有幸被选为个人代表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为四化服务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表彰大全。我和其他代表怀着激动的心情参加了人民大会堂盛大的国庆联欢晚会,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二万多群众欢聚一堂,共度佳节,使我终生难忘。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这次大会的召开。习仲勋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大会致的贺词中,肯定了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工作成绩,提出了语重心长的几点希望。他还要求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要同